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8 期

第 1-31 頁 2004 年 5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 古典文學研究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

陳友冰\*

## 摘 要

本文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歷程進行了回顧，分析了當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所處的困境和存在問題，並從參與現實文化創造、體現當代人文關懷；著手古代文學研究結構體系的重新建構，以期形成一個獨立、明晰的學科畛域和穩定、開放的結構體系；找出研究觀念變革的著力點，形成科學、多種的研究手段與中西文化的交流彙通；張揚學術個性、重鑄學術品格等四個方面為其困境尋找出路，以期通過應變求生存，在生存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完美。

**關鍵詞：**古典文學、研究、歷程、問題、出路

---

\*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海峽兩岸唐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學教授

大陸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無論在研究範圍、觀念或方法上都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進展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臺灣自 1945 年從日本佔領軍手中收復以來，尤其是七十年代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教育投入的加大，古典文學研究的隊伍和研究成果明顯增大、增多，出現了一批很有成就的學者和頗有影響的代表之作。如果我們對兩岸的古代文學研究歷程稍加尋繹和比較，就不難發現：兩岸的古典文學研究雖然沿著各自不同的軌道，卻有著相近乃至相似的歷程，並切存在著相似的急待解決的問題。我們已經跨入的這個 21 世紀，是一個高科技和高度資訊化的社會，人們的價值觀念、工作、生活方式正在發生著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古典文學研究正在遭遇或已經陷入了種種困境，面臨著從來沒有象今天這麼嚴重的價值危機和生存危機。大陸一些地處開放前沿的學者認為：「時至今日，古代文學研究的傳統雖然一直未曾斷過，但其地位的邊緣化卻早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作為古代文學研究者，對邊緣化的事實是應該正視的，也無須作什麼不平之鳴。我們似乎應該思考的是：古代文學研究是不是已走到窮途末路，如何面對這種危機，其價值意義何在？具體研究中的操作手段和方法當怎樣把握」。<sup>1</sup>臺灣學者描述他們五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和當前處境是：「在五、六十年代那個閉關自守的時期，古典文學研究只是循捉著考據、訓詁的老路在寸移步履；而在七、八十年代那個門戶開放的時期，古典文學研究已經幡然領悟要放寬小腳去迎合世界潮流。但到九十年代，又開始有點後悔，顯然有擺蕩於開闢之間的不確定性和前途焦慮感，嘎嘎乎把自己逼向矛盾叢生的絕路上去」。<sup>2</sup>正有鑒於此，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二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要求變革的呼聲遠遠高於相鄰的其他學科，這不僅來自古典文學研究者自身的感受，也來自面對的壓力，即當代社會對古典文學目前的研究方式乃至古典文學本身的隔膜和疏離，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認同上的危機感。我們不能把這種面對古代文學研究乃至古代文學的「不敬」完全委過於商品大潮的衝擊和當今世人的浮薄，我們自身完全有必要作一些自我審視和反省：我們的研究方法和表達方式是不是適應這個高科技、資訊化的社會？古典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在理論體系的構建上是否已經成為一種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已經沿用了一千多年我們還在沿用的手工作坊式的研究方式能否應付電腦網路檢索系統的挑戰？研究者們學富五車的自信於追求會不會因此而被淹沒或取代？當然這種壓力也來自我們相鄰的學科：我們是否承認，社會學、歷史學甚至哲學比我們更貼近社會，更能提供社會變革所需要的借鑒和措施？而比較文學和接受美學也在與我們爭奪古代作家、作品的解釋權？對此，我們既不能簡單的用古代文學是歷史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來逃避參與現實文化創造的責任，當然也不能為了參與當

<sup>1</sup> 徐國榮《古代文學的當代審視—99 年廣東古代文學博士研討會述要》，《學術研究》2000。

<sup>2</sup> 周慶華《衆聲喧嘩與喧嘩衆聲—臺灣九十年代古典文學研究概況》見《臺灣五十年中國文化研究述論》，學生書局 2000。

代文化得到世人認可，就來媚俗，就來急切的展示自己，或盲目的與其他當代學科結合，變得不中不西、不倫不類，從而失去了自我。為此，兩岸的學者似乎都應該很好的審視一下我們自身和周圍發生的變化，共同思考如何使我們這個古老的學科，在理論上構建成一種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在研究手段和表達方式上如何適應這個高科技、資訊化的社會。在應變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完美。

下面擬對近百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目前面臨的問題及應對措施作一些回顧、思考和建議。

## 壹、古代文學研究觀念的百年漸進和學科體系的急待建立

我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有無數傳乎樂章、布在人口的文學佳篇，我們的文學研究者往往有個盲點：他們在優秀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間劃上等號，以為傳統文學作品和傳統的研究方式同樣優美，人們喜愛歷代優秀之作也自然喜愛對它們的研究方式。其實這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典文學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只不過是近百年的事，在此之前，文學研究一直是和哲學研究、史學研究裹夾在一起，美其名曰「文史哲不分家」，實際上在內涵上缺少獨立的價值評判標準，在學科畛域的界定上又缺乏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和研究方法，因此，雖然自從有了文學創作就有了文學研究，古典文學研究的歷史也象哲學、史學一樣古老，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在 20 世紀之前，它並沒有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價值評判標準來說，它要不就是淪為政治倫理的附庸，認為道是金玉，文不過是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sup>3</sup>直至把「人民性」、「現實主義」作為評判古代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最後鬧出李白、李賀、李商隱都是大法家的大笑話；要不就成為個人性靈情趣的表達方式，以「獨抒性靈」、妙悟、「無迹可求」作為評判古代作家作品的標準。從研究方法來說，古代文學研究一直也是依賴（或者說是借用）經學的訓詁、考據、註疏和史學的知人論世等研究手段，從而無法確定自己的理論畛域。只是在「進入 20 世紀以後，特別是二、三十年代以後，文學史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sup>4</sup>作家、作品研究的情況與文學史研究相近。

二十世紀初以梁啟超、胡適、王國維為代表的一批古代文學研究者，面對世紀之交轉型期的動蕩，鑒於傳統的「義理、考據、辭章」已難以再吸引世人的注意，也為了使文學研究從經學、史學中剝離出來而形成獨立的學科，首先在文學觀念和價值評判標準上進行改造變革以適應世變，以期建立現代意識的學科體系。梁啟超提出「情感中心說」作為文學研究的本體和價值評判標準，企圖以此

<sup>3</sup> 歐陽修《與樂秀才第一書》，見《歐陽文忠公集》。

<sup>4</sup> 袁行霈《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 1997.5。

代替儒家的「文以載道」的價值體系，確立獨立的文學本體論。從 1922 年起，他陸續發表《情聖杜甫》、《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屈原研究》和《陶淵明》等古典文學研究論著，強調「好文學是涵養情趣的工具」<sup>5</sup>，肯定「詩為表情之具」<sup>6</sup>，倡導情感說。他把傳統儒家詩論中的「詩聖杜甫」改為「情聖杜甫」，因為「他的情感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極其真實的，極其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它全部反映不走樣子，能象電氣一般一振一蕩地打到別人的心弦上。中國文學界寫情聖手，沒有人比得上他」。<sup>7</sup>王國維則借用叔本華的悲劇生命理論和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中的「淨化說」，一反傳統的「三不朽」理論，強調文學的悲劇體驗和淨化功能，認為這是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所在，這更是一種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本體論。他的這種新觀念在其《紅樓夢評論》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繹和體現。他認為《紅樓夢》的價值就在於它「示人生之真相」，能「感發人之情緒高而上之」；就在於它調動了人們普遍的審美經驗和審美嗜好：「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不經驗之也」；就在於它體現了不同于傳統的價值觀：「《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存乎此也」。<sup>8</sup>他說的「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即是指文學創作和欣賞中的普遍的生命體驗和超越；他說的「大背吾國人之精神」，則是指這種體驗和超越不同于傳統的教化觀。胡適在 1914 年初留學于美國時，將西方「歸納的理論」、「歷史的眼光」、「進化的觀念」看成改造中國學術的「起死之神丹」；1923 年他又提出「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比較的研究」作為古代文學學科建設中「同人努力的方向」。<sup>9</sup>其中反復提到的歷史眼光並非是恢復傳統，而是倡導改良，即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sup>10</sup>胡適並把這種革新觀念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的實踐中去。在唐代文學研究上，他於 1915 年先後發表了《讀白居易〈與元九書〉》和《讀香山瑣記》兩篇論文，運用西方近代文學理論來研究唐詩，把唐詩分為理想和寫實兩大流派，以一種貼近人生、寫實創新、自然解放的新的價值觀來重新審視唐詩，從而得出雖有時失之偏頗卻異常新鮮獨到的結論來。例如在唐詩分期上，他一反傳統的盛、中唐分法，根據貼近社會、反映離亂人生這一新的價值觀，將安史之亂後的八世紀下半葉到九世紀上半葉（755—850）這近百年時間劃分為一個獨特的階段，將杜甫作為這一階段的開端，以「學習杜甫」作為結束。而不是象傳統的那樣以杜甫的年齡和創作活動分期，和李白一起放在盛唐階段。作者認為這個階

<sup>5</sup> 《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附錄二“治國學雜話”，見《晨報副鑄》1923.6.18。

<sup>6</sup> 《詩經》見《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清華周刊叢書社 1925。

<sup>7</sup> 《情聖杜甫》，見《晨報副刊》1922.5.28。

<sup>8</sup> 《情聖杜甫》，見《晨報副刊》1922.5.28。

<sup>9</sup> 《胡適留學日記》167 頁，見《胡適文存》一集卷 3；《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見《國學季刊》一卷 1 號。

<sup>10</sup> 《文學改良芻議》，見《新青年》2 卷 5 號。

段的特點是「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話雖偏頗，但這種分期方式和對其特點的概括，確是從內部規律上抓住了文學流變的走向和最顯著的特徵。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的貢獻，既不同于「章太炎師」和「師祖俞樾」，他們只是熱心古小說的輯錄鈎沈；也不同于梁啟超和胡適，他們主要是提高小說這種文體的地位，在價值觀上作出努力。魯迅一方面反對傳統的教化說，「把小說變成修身的教科書」，以一個小說大家的創作眼光來品味、評價古代小說，注重其「文采與意想」等藝術的價值和「發揚真美，以娛人情」的怡情功能。如稱讚唐傳奇好就好在「敘述婉轉，文辭華豔」，多「幻設」與「藻繪」，而宋人「增其嚴冷」又喜作「篇末垂戒」，不免枯燥無味。它稱讚《世說新語》，除了其「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的藝術成就外，更因為其並非用以「喻道」或「議政」而是「為賞心而作」「遠實用而近娛樂」。<sup>11</sup>另一方面，他又摻入西方的文學觀念，在文學史的編寫上主張借鑒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而勃蘭兌斯的則把文學史的職責界定為「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sup>12</sup>這同我們在八十年代還在呼籲，要研究古代作家的心路歷程相比，魯迅無疑是個先驅者。

前賢們所作的種種努力無疑是可貴的、也是卓有成就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包括古代文學的學科體系已經建立，因為正如前面所言，一個現代意義的人文學科的建立，首先要有一個明確區別於其他學科尤其是相鄰學科的畛域，這個畛域的確立有賴於對它文本意義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有明確的瞭解，也有賴於對它的本體、內涵和外延作理論上的清晰而明確的界定和闡述，而這些古代文學學科建設的前驅者們，或是由於後來追求目標的轉向，或是由於政治立場的改變，或是由於學術思想的變化，他們都沒有對自己發現、倡導的新的研究觀念作系統的整理和進一步的探討，僅停留在啓蒙這一步，甚至從原來的起點上後退。梁啟超的治學之道是與時推移，前期當他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進行文學研究時，他強調文學的社會教育功能，以「布新利俗」為宗旨，其《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譯印政治小說序》都是這種文學觀念的產物；後期以學者身份從事文學研究，又傾向前面提到的「情感中心說」。當然，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甚至可以相互配合，但問題在於不能把某一方面強調的過了頭，而且應該將兩者納入一個統一的協調的體系之中，梁啟超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只能是個啓蒙者而非現代古代文學研究體系的建立者。王國維對現代學科建設的考慮比梁啟超來得具體，也更有條理一些。他提出借鑒西方學理，從三個方面來改造中國學術：一是輸入新學語、創造新學語，二是認清現代學科分化的事實，有系統地研究各個學科；三是

<sup>11</sup>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70、103、202頁。

<sup>12</sup> 《致徐懋庸》，見《魯迅全集》第12卷，303頁。

重視研究形而上學學科，提高中國人的思維能力，把美學放在最高境界。<sup>13</sup>這種思考無疑是清醒的和有建設性的，但它是寬泛的，實用于整個人文學科甚至自然學科，具體到古代文學研究這個學科體系建設，它有那些區別于其他人文學科的特點和建設是獨特要求，作者只是在《紅樓夢研究》和《人間詞話》中給了我們某些方法性的示導，缺乏體系上甚至理論上的建構；在具體運用上，又犯了今日學者仍然存在的機械生硬的通病，它用叔本華哲學來分析《紅樓夢》，就有不少牽強之處。例如叔本華所說的「生活之欲」本是一個德語概念，其中的「欲」與漢語的 yu 不可能同音，這是個常識，但王氏為了套用叔本華理論，便將它與賈寶玉的「玉」聯繫起來，來論證賈寶玉的「生活之欲」，那麼，黛玉、妙玉也帶「玉」字，是否也意味著「欲相」呢？黛玉之死，是寶玉出家的主因，《紅樓夢》前八十回中就有這樣的暗示，但王國維從叔本華的「生活之欲」出發，卻將事物的本源來了個顛倒：是黛玉的活著妨礙了寶玉的出家：「所以未能者，則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遂決」。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近年來屢被學者們提起，作為本世紀表達最通俗、最簡潔也最響亮的一個學術口號，自有它的學術史價值，特別是幾十年來它被誤解和受糟蹋，今日學者對它肯定為它定位，還帶有還歷史於公道的平反心態。但如從古代文學研究學科建設這個角度來說，這個口號則是矛盾的。「大膽的假設」是受杜威設疑解疑的思維術和赫胥黎存疑主義的影響，體現的是一種創新精神，一種背叛傳統習見的願望，「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sup>14</sup>他的《白話文學史》、對《紅樓夢》、《水滸》等不同于傳統的批評眼光和價值重估，他的「歷史進化之眼光」，無不皆源於此。但接下來的一句「小心的求證」卻又由突破傳統研究觀念這個預設的目標回到了知識認知的舊軌，由新的研究方法的期待又倒退回傳統的歷史主義方法。梁啟超評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現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十有九很淺薄很謬誤」。<sup>15</sup>從此，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倡導「科學的方法」，自詡為「方法的自覺」的胡適讓位於「歷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文學革命」的口號亦為「整理國故」所替代。胡適在古代文學學科體系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探尋上轉了一個圈，又從原來的起點上退了回去，給後人平添了許多喟歎和思索。聞一多在古代文學研究觀念上的情況與此相類：他在運用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比較文學等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詩經、楚辭、唐詩方面有眾多的發明，也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但在執教清華大學以後，傳統的力量又在習慣中複歸，專為《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系年考證》這類考據之學了。魯迅的情況稍微複雜一些：魯迅的治學思路基本上是清儒之學，他推崇的顧

<sup>13</sup> 《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見《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sup>14</sup>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一集卷 2，216 頁。

<sup>15</sup> 《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時事新報 1922.3.13。

炎武即是清學開山之祖，加上受章太炎師的影響，治學中又特重金石、小學等考據之學，推崇阮元、俞樾、孫詒讓等朴學大師。<sup>16</sup>但魯迅又是「文學革命」的主將，早年深受進化論、佛學的影響，後期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彼又深研科學，酷愛美術，故不為清儒所囿」，<sup>17</sup>所以他既有《嵇康集》校訂、《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之類的考據輯佚，又翻譯介紹勃蘭兌斯、普列漢洛夫的文學理論，寫出了《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體現新的文學研究觀念和手段的論著。他還不滿當時用歷史方法寫的多種文學史，想「認真一點，編一本較好的文學史」，<sup>18</sup>以實現其「縱觀古今，橫覽歐亞，擷華夏之古言，取美英之新說，探其本源，明其族類，解紛挐領，粲然可觀」<sup>19</sup>的學術理想。只是後期一個革命家的社會責任感使他作了先「做些有益的文章，至於研究，則于餘暇時做」<sup>20</sup>的人生選擇，直至去世，此願望也未能實現。這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來說，不能不是件憾事。

大師們去世以後直至四十年代末，中國內戰外患，民生艱難，「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無論是現實的生存危機還是出於對中國前途命運的關懷，都遠遠優先於古代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的思考。鄭振鐸、陳寅恪、唐圭璋、夏承燾、陸侃如、馮沅君、劉大傑、譚正璧、嚴望耕、台靜農、鄭騫、盧元駿、潘重規、蘇雪林等能在顛沛之中不忘著述，在難以容忍的境遇之中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堅忍不拔地從事名山事業，使中國學術一脈孤懸、賴以不墜，實屬難能可貴，遑論學科建設創新發展？進入五十年代後，兩岸在政治上雖壅塞阻隔，但古代文學研究卻因歷史傳承的相同和面臨的文化生態相近，卻產生過類似的困擾，相近的爭論和面對著幾乎相同的急待解決的問題：

五、六十年代的臺灣風雨飄搖，當時的「學者受圖書缺乏及生活條件惡劣之限，難於專一研究。除了錢穆、嚴耕望、台靜農、勞榦、張秉權、饒宗頤等人，在大陸時期即有著作、論著較為可觀外，其餘學者成就並不顯著」。<sup>21</sup>「在方法、論題與範圍上，還是多見自乾嘉傳統乃至民國後『考據風』的承襲，較少見新方法與新領域的開拓」。<sup>22</sup>進入七十年代後，隨著經濟的起飛和教育投入的加大和留學回歸學者的增多，古典文學的研究觀念也開始發生變化。當時採用西方文論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主要有兩類：一是主題學和原型批評，它後來成為研究中國神話和民間故事的主流方法，其成就在臺灣已是不爭的事實；另一種是新批

<sup>16</sup> 參見《魯迅全集》1卷199頁，3卷322頁，5卷536頁，8卷55頁、175頁。

<sup>17</sup> 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上海複社1938。

<sup>18</sup> 許廣平《欣慰的紀念》第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sup>19</sup> 許廣平《欣慰的紀念》第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sup>20</sup> 《兩地書》，《魯迅全集》11卷184頁。

<sup>21</sup> 李建昆《唐代文學研究趨向與重要書目解題》。1997.11.21 臺灣大學學術報告。

<sup>22</sup> 趙孝萱《臺灣五、六十年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概況評述》，見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臺灣人文學》，學生書局2000版。

評，主要用來研讀古詩，其主要倡導者為臺灣大學外文系的教授顏叔元。從 1972 年起，顏氏陸續在《中外文學》上用「新批評」方法對王融的《自君出之矣》、李益的《江南曲》、朱慶餘《近試題張水部》、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作出新解。<sup>23</sup>由於顏氏把其中的「性意象」解釋得過了頭，以至把《自君出之矣》中的「金爐」、「明燭」都解為兩性暗示，《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和《長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帶雨」也都作為「性」的影射，這就讓喜愛中國古典詩詞沖和雅致之美的讀者感到無法接受。另外，他又擅自改換原作題目來符合「新批評」的解釋，如將《近試題張水部》改為《停紅燭》，認為原題「只說明了寫詩的場合，與詩的內容毫無關係」，因而引起了一部分學者如葉嘉瑩的不滿。葉嘉瑩於 1973 年發表《漫談中國舊詩傳統》，對上述研究方法提出批評。葉氏之說意在強調文學研究中基礎知識和基本功的重要，並非拒絕新方法的引進。她的《迦陵談詩》（三民書局 1970），就不是正統的學案、箋證、義疏，而著重從句式、章法結構和意象來解讀杜甫、李商隱等人的詩作，明顯可看出西方新批評的影響。問題在於當時雙方都走得遠了一點：而對於顏叔元來說，他對一些人並不瞭解新批評方法和在解釋中國古典詩詞上的優長，而只在個別例子的具體解釋上大做文章也感到不滿，特別是葉文中無意流露出的「教導」語氣更觸怒了他，於是，他在 1973 年底著文《現代主義與歷史主義》予以反駁，一些學者也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遂形成一場爭論。這場爭論整整持續了十年時間，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漸趨消歇，其影響是相當深遠的。即使是葉嘉瑩的學生，也開始把葉氏在古典文學研究中著重於意象、結構、語言的細膩分析同新批評的方法進一步結合起來，如李元貞的《黃山谷詩與詩論》（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1972），吳達芸《韓愈生平及其詩研究》（臺灣大學學位論文 1972），吳興昌《李白詩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1972），張淑香《李義山詩析論》（藝文印書館 1974）。至於才氣縱橫的柯慶明，更向前邁進了一步，用這種兩結合的方法寫出了一系列的美學論著，如《境界的再生》（幼獅文化公司 1977）、《境界的探求》（聯經出版公司 1977）等。而後來的新生代學者更是以此為起點，繼而對傳統的研究方法發出更激烈的批評，更自覺地要求建立新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體系，龔鵬程即是其中超前的一位。他認為：「國學界在思維形態、治學方法、表述方式等方面都未能充分現代化，都不能與整個學界對話，正是它生存發展最嚴重迫切的難題」。<sup>24</sup>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他陸續發表批評傳統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的言論，從而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例如他檢討了歷來 149 位文學博士的論文，認為大都不能稱之為論文，因為只會討論生平爵裏、著作版本而「比較缺乏方法意識」，因而

<sup>23</sup>這幾篇文章後來都收入在學生書局出版的《談民族文學》一書中。

<sup>24</sup>《龔鵬程四十自述》金楓出版社 1996。



「惹了不知多少是非，擔了不知多少罵名」。<sup>25</sup>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和體系的構想。他認為這個體系至少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構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詮釋，如文學術語；第二是應該用現代化的觀念和方法去挖掘新資料。他認為，這種『自己的方法』與傳統的研究方法並非如水火不能相容，相反也會使」傳統的研究方法做出更開闊的發展」。<sup>26</sup>龔氏的這種變革主張，得到了一批九十年代的年輕學者的呼應，其中以周慶華《眾聲喧嘩與喧嘩眾聲——臺灣九十年代古典文學研究概況》，連文萍《80—90年代臺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風潮》等較有代表性。<sup>27</sup>但是龔氏的上述變革主張在臺灣並未獲得普遍的認可，在大多數古代文學研究者的心目中，龔鵬程只是一個富有才華的狂放學者，或是一個自負又怪異的奇才，金楓出版社在《四十自述》的封面所作的廣告很能代表時人的心理：「他是臺灣最年輕的博士，他是臺灣最年輕的文學院院長，現在他又是最年輕的大學校長」；讀了這本書，「才明白什麼是自負的定義，才曉得什麼是真正的叛逆」。

在新的研究方法實際運用上，九十年代後期的一批年輕學者有不少較為成功的嘗試，以唐代文學研究而言，如蕭麗華的禪宗美學與王維詩歌關係的研究，曹愉生的唐代詩論與畫論關係的研究，衣若芬晚唐五代題畫詩審美特徵以及李商隱詩的美感特徵研究，彭雅玲的借用現代語言分析方法來探討皎然等人的創作論和體裁論等。也許，新的研究方法終獲普遍認可並最終擺脫對歷史研究等方法論的依賴，乃至新的研究體系的確立，就建立在這些扎實的實際操作之中。

1949年以後，大陸的古代文學研究觀念起了個根本性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成為唯一的指導思想，對作家生活時代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分析和作家階級屬性的判定取代了對作家心靈的把握和作品藝術美的鑒賞。這種觀念和視角的轉換彌補了傳統研究觀念中對作家所處時代的忽視以及那種封閉的研究狀態，但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片面的理解和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機械的搬用，從1949—1978這三十年中，這種觀念的變化並未使古代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得以建立，相反連知人論世、商討意境、探究心史這些傳統的治學方法也一律斥之為封建主義的唯心史觀，至於王國維、胡適等人引進的西方文學觀念也統之為洋奴哲學皆加以摒棄。一方面割斷傳統，一方面自我封閉，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體系只剩下兩個標準：一是政治標準，即看這個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另一是藝術標準，即從社會效果上判別藝術水平的高低。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之間，又有個主次之分：「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sup>28</sup>在執行這兩個標準的實際過程中，「人民性」又往往被狹隘地理

<sup>25</sup>《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見《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幼獅出版社1987；《龔鵬程四十自述》金楓出版社1996。

<sup>26</sup>《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見《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幼獅出版社1987。

<sup>27</sup>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臺灣人文學》，學生書局2000版。

<sup>28</sup>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826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解為只有揭露封建黑暗，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才具有人民性，民歌、民謠、民間故事等民間文學才真正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主流和代表：「不把民間文學放在文學的正統地位上就不能反映文學發展的真實面貌，也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sup>29</sup>而藝術水平的高低也被簡單地規定為是否採用了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根據這一標準，白居易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而「從唐初的宮廷貴族文學、王維、孟浩然的隱逸田園詩派，一直到中晚唐的各種形式的唯美主義詩派，構成了唐詩發展中的反現實主義逆流」，<sup>30</sup>一概應予否定和排斥，因為「內容愈反動的東西愈帶有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加以排斥」。出於歷次運動和政治鬥爭的需要，這種標準又會因人、因時而異，例如在「文革」的「評法批儒」運動中，李白、柳宗元、劉禹錫，甚至從五十年代以來一直受奚落的李商隱這時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成了歷史上批儒的正確路線的代表。李商隱不再是頹廢的唯美主義詩人，而是「晚唐詩壇反分裂的的鼓手」，就連他的纏綿傷感的《無題詩》，也成了「晚唐儒法鬥爭一面三棱鏡」。<sup>31</sup>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使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八十年代以來，古典文學研究再次遭到外來文化愈來愈厲害的衝擊；現實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的迅速轉換，也使古代文學研究在現實生活中逐漸失去自己的位置，愈來愈難以用現有的方式與社會溝通，從而導致某些學者所雲的「失語症」；在沒有擺脫對哲學、歷史學依附的畛域不清的研究領域上，現在又受到比較文學和接受美學的挑戰和爭奪。特別是今天，我們又一次面臨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期，古典文學研究從來也沒有象今天這樣面臨著價值危機和生存危機。但是，危機往往與機遇並存，山重水複之後常常會柳暗花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也使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觀念的撥亂反正有了可能；改革開放政策也為引進西方的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契機；學術研究自由度的加大和相對寬容的社會環境，更為新的學術思想和研究體系的提出和建立提供了保證。所以從八十年代初起，大陸學者又開始了建立古代文學學科體系的新一輪的探尋。傅璿琮的《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 1980）和程千帆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開風氣之先。前者有意識地運用丹納的地域學說和詩人群體理論，首開群體研究之風；後者則開啓了在廣闊文化背景下研究唐詩的先河。傅璿琮在此之後又陸續發表《文學編年史的編寫與唐代文學研究》、《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的思考》、《文學古籍整理與古典文學研究》以及為《中國古典文學走向世界叢書》、《百年學科沈思錄·序》和《唐五代文學編年史·自序》等論文，對唐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得失，未來的走向、趨勢，應對未來的理論準備和實施思考，以及唐代文學的史料學、唐詩學、唐代

<sup>29</sup>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 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第 4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sup>30</sup>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 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第 21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版。

<sup>31</sup> 《晚唐儒法鬥爭的一面三棱鏡》，見《中山大學學報》1975.6。

文學史、唐代學術史等學科建設都有著細緻的分析、切實的建議和前瞻性的思考。袁行霈、徐公恃、葛曉音、陶文鵬、王兆鵬、董乃斌、郭英德、葛景春等一批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也先後著文，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文學史研究的理論和前瞻、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衡估與思考、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唐詩研究，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私人化」傾向，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建設進行回顧、總結、反思和前瞻。

1983年6月，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外語學院等共同發起召開了全國第一次比較文學研討會，嘗試用比較文學、文化詮釋學和當時稱爲「新三論」<sup>32</sup>中的系統論來研究中國文學；1989年5月，文學遺產編輯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和古籍所，信陽師範學院中文系和古籍所聯合主辦了「建國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反思討論會」，對1949年以來大陸的古代文學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進行反思和檢討；1983年7月，《文學遺產》、《文學評論》、《語文導報》、《天府新論》等幾家有影響的或前衛的刊物在杭州聯合召開「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可以說是這個時期古代文學研究思想和方法論上一次集中的探索和總結。進入九十年代後則有專門針對文學史觀念轉換的一系列研討會，如1993年《文學遺產》召開的關於文學史編寫的座談會，1997年4月15日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組織的《唐代文學史》研討會。《江海學刊》於1994年召開的「文學史觀與文學史學研討會」和1997年的「文學史學研討會」等。特別是在接近二十世紀末的歷史轉換關頭，隨著要求轉換研究觀念、建立獨立學科體系的呼聲日高，類似的討論更爲頻繁、更爲自覺，也更加深入。單是最近兩三年，一些學術雜誌和大學就舉行過十多次討論會和筆談，論題皆集中在古代文學目前的生存現狀、如何重新確立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觀和學科體系，以及對具體操作和構建的檢討和前瞻。如1998年董乃斌、趙昌平、陳尚君等在《文學遺產》上的筆談：《史料。視角。方法——關於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王齊洲、王兆鵬、毛慶、譚邦和、張皓等在湖北大學學報上的筆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期待觀念的轉換》、《完善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規範》等；1999年9月由《文學評論》編輯部、《文學遺產》編輯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編輯部、南開大學中文系聯合舉辦的「全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博士點新世紀學科展望及資訊交流座談會」；12月由北京廣播學院語文部、首都師大中文系、河南大學文學院、《文藝研究》編輯部共同召開的「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研討會」；2000年5月由武漢大學人文學院和《文學評論》編輯部舉辦的「21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走向及學科發展研討會」；7月在安徽師範大學召開的「中國詩學研討會」；這當中還不包括一些學會年會和作家作品討論會所涉及的古典文學學科建設問題《文學遺產》、《文學評論》《江海學刊》等皆爲此開設過專欄或組織過研討會。這些在研討會上展開的爭論，以及陸續發表的關於古代文學研究現狀分析和學科建設的理論探討，對清醒地認識我

<sup>32</sup>當時的新三論指資訊理論、系統論和耗散結構論。

們的生存狀態，改變傳統的研究觀念無疑是有益的；對獨立的、具備現代學科特徵的古典文學研究體系的逐步建立，也是一種積累和基礎性的工作；如果這種爭論和呼籲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和共鳴，那麼古代文學研究就更為自己爭得了生存的條件和發展的希望。我們只要稍微回溯一下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歷程，就會發現在研究觀念上已有了較大的轉變，對西方研究方法的引用、接納也有了長足的進展。1983 年在杭州聯合召開的「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上，首次把「宏觀研究」的觀念引入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並探討了以心理分析、比較文學、系統論、結構主義等新方法來研究古代文學的可行性時古代文學界的反映是冷漠且懷疑的，而且由於當時存在著理論準備不足、運用上沒有很好地消化吸收等弊端，很長一段時間為一些古代文學研究者所詬病認為所謂新觀念不過是「套用新方法，濫用新名詞，以文飾其淺陋」，而且敗壞了研究風氣，「以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界有一部分人，仍熱衷於撰寫虛空、浮泛，徒有方法之新穎，而無突破之實質的文章」。但到了 1998 年在南寧召開的唐代文學第九屆年會上，大家已以一種寬容的心態來看待新觀念和新方法，而且相當一部分學者已認識到：傳統的研究方法必須變化，必須尋找新的研究方法才能適應世紀的新變。他們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很大一部分的唐代文學研究論著觀點內容重復、論點相似、手法陳舊，在低水平上徘徊而無實質性的突破，這正說明我們的研究者是多麼需要更新觀念、改變研究思路和手法」，「而域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正好可以使我們打破學界封閉多年後形成的千篇一律的研究模式，可以為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使之生生不息，亙古常新」。<sup>33</sup>在實際研究中，也出現了象如孟修祥的《謫仙詩魂》（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董乃斌《李商隱心靈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陳文忠《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 1998）等較好地運用新觀念、新方法來研究古代文學的論著。如果古代文學界都能有這種危機感，都能作一些新的觀念、方法方面的探索和嘗試，積累經驗，共同投入古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之中，而不是陶醉于傳統，既隔斷于現實又抗拒於西方，那麼，建立一個自成系統的、具有完全意義的現代學科——古典文學研究是可期的。

## 貳、古代文學研究的結構體系和構建設想

現代學科的生命力，取決於學科基礎的堅實、學科體系的科學、現實生活的需求和一個既結構穩定又開放交叉的架構這四個要素。從學科基礎來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無疑是厚實的。一千多年作家、作品這個巨大寶庫作為研究物件，人們對古代文學作家作品的仰慕和傳頌，以及與古代文學幾乎同步的古代文學研究，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在資料收集整理、作家作品論以及文學史的編寫上的大量

<sup>33</sup> 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鑒 1999。

實踐和濃厚積累，都使這個學科體系的基礎分外堅實。現在著重要解決的是剩下的是科學的學科體系、現實生活需求和穩定而開放的結構這三個問題。

## 一、獨立、明晰的學科畛域和穩定、開放的結構體系

一個獨立於歷史學、中國古典哲學研究物件的古代文學研究是我們近百年來的期盼，明晰的學科畛域和穩定、開放的結構體系是成爲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的必要條件；嚴格的運作範式和多種研究手段的綜合運用，則是更多更好地獲得研究成果和融入當代社會的重要渠道。

古代文學研究的研究物件自然是古代文學，這似乎無須討論，但在實際研究中它卻有個與考古學、史學、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結合的問題，如果沒有這種結合和配合，古代文學研究就顯得孱弱，也不可能寬廣和深透；但如過於依附又會失去自我，淪爲史學、哲學甚至文字學、修辭學的二級學科。現在有一些論著，雖然以古代作家作品爲研究物件，但其內容卻屬於文化學、經濟學或社會學，這種研究與其說是古代文學研究範圍的擴大，還不如說古代文學研究自身的喪失。有位學者將中國詩學研究分爲五個層次：第一是文獻學，第二是文藝學，第三是文化學，第四是人本學，第五是哲學。<sup>34</sup>作者想使古代文學研究有更高的追求，但客觀上只會導致古代文學畛域的模糊和自身價值的喪失。另外，古代文學內部，也還有個子學科的位置和關係處理問題。受上面這位學者的啓發，我想古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的畛域和內部架構可否作以下設定：

### （一）文獻學研究

這是古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得以成立的基礎和前提，古代文學文獻的豐富和完整，才能正確、全面地把握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人文內涵，也才能系統地探究一個時代、一個流派的發展、演變規律，從而提供真實的、全面的文藝學乃至美學的熏陶和借鑒。近百年來尤其是近二十年來，這個方面收穫最豐、成績最著。以唐代文學研究而言，近十年來就有數十種規模大、質量高的作家作品總集、別集和相關文史資料、工具書出版，如陳尚君等人的《新編全唐詩》，劉尊明、王兆鵬等人的《全唐五代詞》，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方積雲、吳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中華書局周祖撰則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隋唐五代卷》陳抗、林滄等人的《全唐詩索引》、鬱賢皓《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周勳初有《唐人佚事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以及詹瑛八卷本《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錢仲聯、馬茂元《韓愈全集》等作家別集的箋注本和集注本。

<sup>34</sup> 《中國詩學研究座談紀要》，《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0.3。

但是，文獻學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已有資料的點校、疏證、輯佚、彙編這個學術層次上，還應該去發現和研究新的資料，這才能體現學術創新。王國維曾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sup>35</sup>他本人就利用當時新發現的甲骨卜辭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載的殷王世系基本正確，從而否定了有人對《史記》所載的商代部分的懷疑，並由此推斷《夏本紀》部分也是基本可信的。這種新的資料發現和研究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已著錄的文字資料如四部典籍、佛道兩藏、敦煌遺書、方志譜牒、稗史地書、叢書類書、域外漢籍進行文學目的搜覽和檢索，以期有所發現。前面提到的一些影響較大的集成之作，皆重視這方面的發現和研究。如陳尚君等人的《新編全唐詩》，在清代《全唐詩》之外，又輯得唐詩 60 卷，4600 餘首，殘句 1100 餘句，相當於《全唐詩》收詩總數的七分之一，作者總數的一半，遠遠超過了前人所輯唐代佚詩的總和。編者在集佚的過程中，就是遍搜了四部典籍、方志譜牒、佛道兩藏、石刻法帖、敦煌遺書、域外漢籍，僅方志一類，陳氏就翻閱過兩千多種。周勳初的《唐人軼事彙編》收集唐五代歷史人物近 2700 人，共 170 余萬言，引用唐宋人所撰的雜史、傳記、故事、小說近 300 種。二是對尚未著錄的地面文物資料如碑銘、楹聯、匾額、塔壁題字、摩崖石刻等。隨著交通的日益發達和旅遊業的發展，過去一些閉塞不為人知的景點陸續被開發，提供了相當多的古代文學方面以及與古代文學有關的歷史社會、風俗民情、藝術文化等方面的新資料。例如，山西的地上文物約占全國的三份之一以上，僅清以前的寺廟建築就有 2000 多座，但進行了文字整理的不到 150 座，占 7% 左右。臺灣學者對這類田野調查較為重視，如 1995 年秋季，由淡江大學鄭志明教授籌劃的「大學院校臺灣民俗田野調查」，由淡江大學、輔仁大學、臺北醫學院、銘傳管理學院等四所大學 20 多位學者參加，歷時一個月，事後形成了 17 篇專題論文並召開了研討會。臺灣中研院張光直院士倡議實施的「臺灣史田野調查」，從 1986 年起一直進行到現在，而且定期出版一本《田野研究通訊》。大陸學者近年來也有人注重這種研究。唐詩研究者鄧志方以浙東淡溪為主幹，把這條古旅遊線上十四個景點的文物，與有關的 207 首唐詩加以比較，佐以大量實證資料，以探求當年浙東唱和的地點、成員、規模和特色，出了本專著《浙東唐詩之路》。但是，由於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生活方式、工作環境和經費條件等限制，這方面研究做的不多，還存在著很大的研究空間。三是地下的出土文物。隨時注意用新發現的文獻資料來補充我們的研究物件，修改我們的現有的結論和文學觀點，可以使我們對古代文學的認識更加完整、更加科學、更接近事物的本來面貌。在古代文學研究上，本世紀敦煌《雲謠集雜曲子》的發現就改變了詞起于中唐，慢詞起源于柳永的舊說。學者們通過對藏經洞中新發現的詩歌、變文、俗賦的整理和研究，豐富了中國文學史和部分改變了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流變的認識。

<sup>35</sup>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文集》第 4 卷 33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

1972年銀雀山出土的《唐勒賦》殘篇，1975年睡地虎出土的《爲吏之道》後面所附的八篇韻文，1982年出土的阜陽漢簡《離騷》、《涉江》殘片，1993年尹灣出土的《神烏傅(賦)》，則進一步否定了對屈原是否有其人和宋玉賦真偽的懷疑，對賦體文學的形成、初期賦的特徵，賦與民間文學的關係，漢賦的分類以及漢代故事賦的特點有了一個更接近事物本來面貌的認識。同時通過典籍所載與出土文物、地上與地下資料的互比互證這種「二重證據法」，以及在研究過程中對考古學、目錄學、版本學、文字學、音韻學等學科的借助，也會改變我們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

## (二) 文藝學研究

如果說文獻學研究與歷史學、考古學、目錄學、文字學、音韻學還有一定關聯的話，那麼，對古代文學進行文藝學研究則是區別於其他相鄰學科的主要特徵所在。古代文學的文藝學研究，當然應包括作家作品的藝術風格和特徵、表現手法的繼承和創新，各種文學體裁的發展和流變，但我以爲當前較薄弱的、急需納入研究體系的是以下幾類：

### 1. 個性研究

「文學是人學」，作品是作家的精神創造活動。文學研究必須注重於作家的精神世界。由於社會背景、生活遭遇尤其是氣質秉性的不同，每一個作家都會有獨特的個性，每一部作品也會有自己的特色，就象「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一千個作者也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因此我們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與時代背景、生活道路、政治思想、文學主張、作品內容、藝術特色的分析歸納相比，首先要關注作家和作品的獨特個性，探索他們的心路歷程和心態變遷的歷史，研究其氣質和心理與其創作傾向和藝術風格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僅要揭示這種氣質心理的種種表徵和所造成的結果，還要描繪出它的走向和過程。如果說：「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是讀者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體會的話，那麼，古代文學的研究者就是要說出這難以說清的妙處。近年來，有相當一部分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開始呼籲並著手古代作家心靈研究，如甯宗一的《關注古代作家的心態研究》，許建平關於「建立心態文學史學」<sup>36</sup>的呼籲。在實際研究中以唐代文學研究而言，近幾年就有如董乃斌《李商隱的心靈世界》，孟二冬的《論中唐詩人的審美心態和詩歌意境的變化》王東蕾《長吉心態新識》，王蒙《混沌的心靈場——談李商隱無題詩結構》，尙永亮《冷峻：柳宗元審美情趣和悲劇生命的結晶》，全五德《一位正直而軟弱的詩人——王維心態探微》等。董乃斌的《李商隱的心靈世界》把傳統的對李商隱的行年考辨、作品內容風格析論轉移到詩心的探求上來，

<sup>36</sup>分別見《文學遺產》1997.5，《江海學刊》1998.3。

對作家心靈世界進行了一系列頗有新意的探索。

## 2. 詩性研究

我想這應包括作品的詩性特徵和研究者的詩性體驗兩個方面。所謂詩性特徵是指通過作品的題材、體裁、結構、意境、語言、風格所表現出來的情韻和給人們美感，它不一定僅限於詩歌，也應是古典散文、戲劇、小說的追求和評判標的。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蘇軾的《承天寺夜遊》，其中的詩意絕不遜於任何一首強壓清雅、雋永的詩詞；《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秋風五丈原」，《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夜探瀟湘館」，其英雄末路的悲壯，其靈犀一點的綿綿情意，也不遜於《垓下歌》和《子夜歌》。其研究畛域以詩歌而言：題材上應包括對山水、田園、邊塞、隱逸、應制、唱和、送別、懷古、思鄉、愛情、閨怨、佛道、園林、題畫、詠樂等題材特徵和表達上的獨特要求的研究；體材上包括對樂府、古風、律詩、絕句等體裁特徵和產生、發展、流變的研究；表達方式上包括對文辭、聲律、句式、體式、意象、意境、結構、佈局、風格的表徵和形成規律的研究。以此探尋出中國古典詩歌所特有的抒情性、含蓄性、跳躍性、朦朧性、象徵性、獨有的音律和節奏感等詩性特徵，以及在不同作家、不同時期、不同題材、不同體裁、不同表達方式中的不同表現和不同的流變規律。

研究者的詩性體驗是指研究者要具備一定的審美能力和藝術經驗，因為對文學文本的解讀不同於歷史、哲學、法律等其他人文科學，它要求情感的投入和詩心的共鳴。對古代文學作品的反復吟誦會有助於這種情感的體察和理解，所以有的唐詩研究專家甚至說：「沒有吟誦的工夫，根本進不了唐詩研究的堂奧」<sup>37</sup>親身參加創作活動更有利於這種解讀和溝通。如上所述，古代文學研究主要是再現古代作家的精神活動，從中獲得美的熏陶和感悟。如果研究者本身就參與這種精神創造，這樣就能更好地去感受和體悟前人的創作活動，使那種已成爲歷史陳迹的精神活動，通過我們的詩性體悟得以較真實地復活和再現。本世紀初的一些古代文學研究家，如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魯迅、聞一多、朱自清、馮沅君、蘇雪林等，不僅有出色的研究專著，也能寫出美詩美文。梁啟超的「新文體」、胡適的白話詩、魯迅的小說、朱自清的散文、聞一多的詩歌都代表了當時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馮沅君和蘇雪林也是當時女性作家的傑出代表，時稱北馮南蘇。馮沅君的《中國詩史》，蘇雪林對李賀詩風的形成和李商隱無題詩本事的考索，都有許多她們自身創作上的體悟。從當前的研究現狀來看，詩性體驗是個弱項。大陸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老一輩學者，多是理論、創作兼長，但年輕一代中，大多已不會爲詩作賦，倒是臺灣的中青年學者較爲優長，象龔鵬程、柯慶明、方瑜、衣若芬、陳文華等都有美文問世。臺灣還有專門的古典詩詞創作活動。據統計，

<sup>37</sup> 《史料·視角·方法—關於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文學遺產》1998.4，趙昌平發言。



九十年代的臺灣，有民間詩社 50 多個，而且分佈於各縣市。<sup>38</sup>這些詩社每年要舉行二十次以上的詩人聯誼大會，若以每次 300 人，每人創作 2 首詩詞計算，全台民間吟社每年就可創作出一萬多首古典詩詞。<sup>39</sup>臺灣的各級學校古典詩詞教學還比較注意學生吟誦習慣的養成和感悟能力的培養，臺灣的大、專學校還有個「大專青年聯誼會，在中山大學簡錦松教授等的推動下，每年舉行一次吟誦比賽。這種詩性體驗對古代文學的詩性研究乃至古代文學獨立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手段的確立，無疑是有益的。

### （三）文論學研究

包括古代文藝批評、文藝理論和批評史三個內涵。它與文藝學研究雖都以把握特徵、探求源流、總結規律為研究的最終目標，但前者強調的是詩性，後者強調的是理性；前者要求感情的投入與溝通，後者則傾向於冷靜的思考與總結。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作為一個學科體系，其雛形肇於本世紀二十年代末，1927 年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於 1934 年和 1947 年先後出版的上下冊《中國文學批評史》和 1990 年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可視為這七十年間古代文論研究成果的代表。經七十年來的努力，今日已碩果累累。《文心雕龍》研究和唐詩研究同為近二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中成果最豐顯學。但古代文論研究要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現代學科，似還應注意和加強以下幾個方面：

#### 1. 重視古典文論的現代詮釋

中國古典文論強調直覺觀照、言簡意賅、多用比喻又多發散性思維，這是它的特色，但由此又帶來許多今人閱讀理解和研究上的困難，例如多用比喻所造成的其內涵的寬泛性和不確定性；概念、術語使用上的隨意性和不斷更變，很難做一種定義和範疇上的界定，或是過分強調政教功能，或是一味追求神韻、空靈、妙悟，都會造成體系上的單一、混亂和與現代社會的難於溝通，造成前面曾提及的「失語」現象。針對這種現狀，臺灣學者龔鵬程對古典文學研究改革的設想，第一條就是「重構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詮釋，如文學術語」。<sup>40</sup>大陸近年來在古典文論的學術討論會上，也不斷發出古典文論研究的「現代詮釋」或「現代轉換」之類的呼籲。<sup>41</sup>當然，這種轉換或詮釋不僅是話語體系的轉換，更是一種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轉換，只有如此，才能融入當代社會。如何實現這種轉換，「古

<sup>38</sup> 《中國時報》1993.6.18。

<sup>39</sup> 陳文華《古典詩詞的創作及活動》見《1998 年臺灣文學年鑒》。

<sup>40</sup> 《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見《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幼獅出版社 1987。

<sup>41</sup> 劉文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會議討論綜述》，見《文藝理論研究》1993.6；彭會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綜述》，見《文藝理論研究》1998.2。

今對話」和「中西對話」則是有效途徑。這需要當代文論家的配合，更需要古典文論研究者對當代文論的介入和掌握。至於中西的互通，前面曾提及的大師們以為我們作出了範例，隨著我國國門的進一步打開和西方文藝理論的進一步多元化，我們有了更多的借鑒和選擇，當然也更容易失去自我。所以無論是古今對話還是中西互通，都要避免「把古人現代化」，或是生搬硬套西方文論中的一些術語名詞，削足適履，生硬粘貼，搞得不倫不類，將理應使人獲得審美趣味和審美思考的理論研究，搞成空洞無物、索然寡味的文字垃圾。

## 2. 古代文論的理論體系和研究範疇急待形成共識

確立古代文論的理論體系和研究範疇，這是建立現代意義的古代文論學的必要條件。但在其研究體系的構築上，面臨著比文藝學研究更多的問題。羅宗強、鄧國光就認為：「我國的古代文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我們至今似乎並沒有一個完整的認識。這裏有幾個問題尚須研究：一是有沒有體系；二是這一體系是某一流派的體系，還是整個中國古代文論的體系；三是這一體系是由什麼構成的？是範疇，是某些觀點的組合，還是別的什麼；四是這樣的體系是什麼時候形成的，是一時形成，還是自古及今才形成？」作者認為，只有在對「各個重要批評家的文學觀點、各個流派的文學觀點、各個時期的文學觀點，與各種主要的理論範疇都弄清楚後」，方能構築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論體系。<sup>42</sup>至於古代文論的研究範疇，也存在眾多的說法，而且其分析、歸納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有人認為「境」是古典文論的元範疇，又有人認為是「意境」、「和諧」、「味」或「道」；有人又將其分為「本原範疇、主體範疇、物件範疇、創藝範疇、形態範疇和品格範疇」六個層面。<sup>43</sup>這固然反映古典文論的研究體系和研究範疇急待建立和明確，但討論或爭論如此熱烈也是好事，他說明古典文論研究者已認識到其重要性和緊迫性，隨著討論的深入，這個體系和範疇也會日益變得清晰和明確。

## 3. 重視對少數民族文論家和地域群體的研究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燦爛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結果，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畛域，當然要包括少數民族的文論家。但長期以來，除元好問、納蘭性德等少數幾人外，在中國批評史上幾乎找不到他們的名字，相比之下，中國文學史反映的要充分一些。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主持編寫了一套《中華文學通史》，他們認為：「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文學史應該是涵蓋中華各兄弟民族文學貢獻的文學史，也應該是涵蓋中國各地區的文學史，即包括臺灣、香港、澳門在內的文學史，而不僅僅是大陸地區的漢族文學史」。<sup>44</sup>當然，古代文論的

<sup>42</sup> 《近百年中國古代文論之研究》，見《文學評論》1997.2。

<sup>43</sup> 彭會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綜述》，見《文藝理論研究》1998。

<sup>44</sup> 張炯《走向完整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中華文學通史」導言》，文學評論 1996.1。

這種研究狀況在進入九十年代後已有所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在九十年代組織出版了一套 16 種少數民族文學史，主要由少數民族和研究少數民族的學者撰寫，其中就有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文論研究。如《傣族文學史》就列專章評介明代祜巴猛著的《論傣族詩歌》，並介紹了德宏的詩歌理論。<sup>45</sup>《納西族文學史》則評介了明代的木公、木增、木高、清代的桑映鬥、木正源、妙明等 20 多位元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學創作及其文學主張。<sup>46</sup>在 1997 年 11 月召開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上，與會者已發出要重視中國少數民族古代文論研究的呼籲，會上，黃紹清對少數民族古代文論的生成發展、存在形態作了具體論析，對其價值地位也作了充份肯定。李玩彬還就清代壯族文論家鄭獻甫的詩論發表了專論。

中國古代文論家往往是以群體出現的，其文學觀點和主張也往往反映在一個創作流派之中。因此研究古典文論必須注重群體和流派研究。但以前我們研究的往往是人們熟知的一些文學集團和流派，也往往限於中原地區，如新樂府詩派、桐城派、浙西詞派等，對少數民族地區、僻遠地區和知之甚少的則很少關注和發掘。上面提到的《納西族文學史》列專章或專節討論明代的「木氏作家群」，清代「改土歸流」後麗江地區作家群，晚清的「桂香詩社」和維新作家群；「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屆年會」上對近代桂林文論家群和臨桂派詞學的研討，是個資訊，它在古代文論學科建設上應引起關注。

#### （四）文學史研究

文獻學研究和文藝學研究主要是古代作家作品的個案，或者說是橫向研究，文學史研究則是線性研究，或者說是縱向研究它一方面要為一個個橫剖面確定其在文學長河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要從中找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流變的規律，從而為文學鑒賞、文學批評和今日的文學創作提供史的依據和範式。文學史研究實際上包括文學史編寫和文學史研究兩個內涵。中國文學史的編寫，若從 1904 年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算起，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此後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上卷），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遊國恩的《中國文學史》可作為六十年代以前的代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則是分體文學史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之作。近二十年來，各種類型的文學史大量湧現，如中國社科院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稿》，楊海明《唐宋詞史》，羅宗強、郝世鋒主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許總的《唐詩史》等。從九十年代起，又在大量實踐的基礎上開始了理論思考，並有過熱烈的討論和激烈的爭論，

<sup>45</sup> 雲南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七章，690 頁。

<sup>46</sup>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7、8 章。

一些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文學遺產》、《文學評論》《江海學刊》等皆為此開設過專欄或組織過研討會。<sup>47</sup>一些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編寫文學史的體會，對此發表不少有識之見。這對文學史學科畛域的界定和研究體系的建立，是個很好的推動。但要建立完全意義的現代學科體系，解決以下幾個問題是當務之急：

### 1.文學史模式

這是文學史編寫上急待解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目前認識並不一致：有的研究者認為，本世紀前八十年的文學史模式基本上是「他律」，即「詩—史範式」。這種範式只注重文學外部條件，而忽視了「心靈史」，忽視了文學形式的內部動因，因此主張將「詩—史」範式改造為「心態文學史」，而個體心理學及其分析方法，集體心理學及其分析方法和建立文學審美史心理學則是心態文學史的三個理論結構層次。也有的學者主張對文學史研究物件加以改變，由目前的作家—作品的二維研究逐步轉向作家—作品—傳播—接受的四維研究。<sup>48</sup>也有人認為文學史中恰恰要強調「史」，注意「史」的脈絡，只是在說明文學的演進時，要突破過去那種按時代順序將一個個作家作品簡單地排列的單線平圖式勾勒，應當在突出主線的同時進行立體交叉式的描述，清晰地描述出承傳流變的過程。同時在描述中國文學演進時，還要注意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如雅俗之間的互動，各種文體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復古與革新的交替和碰撞，文與道的或離或合等。<sup>49</sup>也還有人主張不需要什麼模式，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總之，關於文學史模式，有些基本認識必須搞清和統一，如和史料學的關係，和哲學、史學、民俗學等其他人文科學的關係，必須真正揭示出文學演變的規律而不是歷代作家作品的排列等，除此之外，沒有必要搞成千篇一律的模式。因為文學史有不同的類型和形式，如文學通史、斷代史、體裁史、流變史、民族文學史、地域文學史、編年文學史等，不同的類型自應有不同的模式和要求，所以不可能也不應只有只有一種模式、一種寫法。況且，只要是嚴肅的學術研究，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寫法反而可以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但模式畢竟是一個學科的學術框架和操作規範，是建立一個現代學科必要的前提。所以建立一個統一的、既寬泛又有具體針對性的文學史科學模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急切任務。

### 2.文學史研究方法

這也是文學史研究中急待解決的問題，目前的認識也有較多的分歧：有人認

<sup>47</sup> 如：《文學遺產》1993年召開的關於文學史編寫的座談會，1997年4月15日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組織的對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研討會。《江海學刊》於1994年「文學史觀與文學史學研討會」和1997年召開的「文學史學研討會」等。

<sup>48</sup> 王兆鵬以及下面引用的許建平、林繼中、莫礪鋒諸文，均見《關於文學史的思考》，江海學刊1998.3。

<sup>49</sup> 《關於文學史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7.5。

為可分為基本方法和具體方法兩種。「基本方法為審美、歷史、邏輯這樣三種」，具體方法包括「近年來人們所引進的文本批評、母題研究、接受美學乃至熵的理論、耗散結構、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等一系列新方法」。<sup>50</sup>有人認為文學史研究的傳統方法是歷史學、文章學、社會學三種，缺的是「文心搏動、是理論建構、是文學精神」，要想在研究上創新，就必須引入「大文化視野、新邏輯學思路、原生態式把握形式主義細讀、審美心理學分析等」新方法。<sup>51</sup>在文學史的方法論上，大家在以下一些問題上基本達成了共識：認為過去編寫文學史以歷史演進為線索表述的多，探求其文學流變脈絡和規律的少；採用傳統的「詩—史範式」者多，探究作家心靈歷程者少；要將過去慣用的評價式語言換成描述式語言；要注意一些新方法的採用；要注意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交叉研究；要從廣闊的文化學角度來考察文學等。這些共識的達成是新的學科體系形成的基礎和前提。

### （五）學術史研究

如果說前四種是以古代作家作品及其承緒流變為物件，學術史研究則是以古代文學的研究者及其研究論著為物件，是對研究者的研究。這門子學科是建立在對古代作家作品、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文論的熟悉瞭解基礎之上，與文獻學、文藝學、文學史研究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互相補充、互相推動的。這門子學科的建立，不僅有助於豐厚古代文學研究者的積累，擴大古代文學的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以此確立有別于西方文學研究體系，也有別于其他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體系，真正體現現代特色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體系。從古代文學研究的四個架構來看，學術史研究要落後於其他三個。儘管我們已有了「詩經學」、「楚辭學」、「龍學」、「唐詩學」、「杜詩學」、「金學」、「紅學」，但是，這些斷代、專人、專著的研究史本身還不完備，有的還只是對此作研究的研究者自身的說法，還未得到圈子外古代文學研究者的認可甚至瞭解。以唐詩研究而言，這是近百年來古代文學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個領域，但當前研究的現狀則是作家作品的考證箋校、文獻資料的集成等史料文獻研究輝煌發達，唐詩發展史的闡釋、唐詩學則貧弱單薄。在對歷代唐詩學研究中，展開得很不均衡，其中有的時段研究比較集中、比較深透，有的時段則比較薄弱，甚至沒有觸及。為此，有的學者曾發出呼籲：「唐詩史料學規模完備，唐詩學還在踽踽獨行，應該是改變這種格局失衡的時候了」。<sup>52</sup>另外就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而言，在已有的「某某學」之外還有極其廣大的研究空間，至於研究史的學科畛域和研究體系更有待建立。

值得欣慰的是，近十年來，學術史的研究相對引起了重視，郭英德、謝思煒

<sup>50</sup> 《審美、歷史、邏輯——論文學史研究的三種基本方法》文學遺產 1994.5。

<sup>51</sup> 《文學史方法的歷史和新方法的誕生》河北師大學報 1995.3。

<sup>52</sup> 胡明的《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文學評論》1999.2。

等編撰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可以說是作了個很好的嘗試。有的學者也開始對古代文學學術史的特點、研究物件做整體性的思考和總結。他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學術史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它的開展是由中國特殊的「大文學」和「範文學」觀念所決定的，也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整體性、混合性等藝術思維方式有關；它和經學研究、史學研究以及文獻學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因緣關係；由於中國古代的文學和學術始終依附於政治教化，因此中國古代文學學術史具有鮮明的政治指向和政治功利性。其表達方式往往重領悟和感受，帶有較多的直觀性、經驗性；操作方法上 豐富多彩但又被大致相似的文學觀念相支配，表現為外部形態的多樣化和內部形態的單一化的奇妙組合，這是古代學術史領域一個幾乎帶根本性的弱點；其發展形態不是西方的那種離心性、波浪型，基本上是一種向心性、積累型。至於其研究物件，應「是自古迄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它旨在描繪和評述歷代文學研究家對古典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想的研究中，所涉獵的領域，所進行的活動，所採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所體現的思想和觀念」。<sup>53</sup>以上所涉及的僅是對歷代文學研究特徵的總結和古代文學學術史的研究物件。至於學術史研究究竟應包括那些範疇，不同體裁、不同時段、不同作家和文學集團的研究史應有那些各自的要求和共同遵守的規範，學術史研究可以有和應該提倡那些方法？這些問題都還未很好涉及，還有段很長的路要走。

## 二、科學、多種的研究手段與中西文化的交流彙通

一個現代意義的人文學科，除了具備一個獨立明確的學科畛域和穩定開放的結構體系外，還必須具備研究手段的科學性和獨特性，表達方式的規範性和現代性。傳統的研究方式可以獲得情感的滿足，卻無助於理性的闡釋和規律的探尋。嚴格地說，傳統的文學研究並沒有屬於自己的研究手段：文本的訓詁和闡釋是經學的，人物的活動背景和活動過程是史學的，如何使古代文學作品和作家研究不致成為經學和史學的附庸，使實證性、感悟性和理論性結合起來，形成屬於古代文學研究自己的獨立的學科研究手段？這就必須摒棄單一的訓詁、評點、感悟、鑒賞等傳統的研究方式，在歷史文獻的搜集、佔有、使用過程中，不再象傳統的做法那樣把歷史的豐富性和綜合性人為地割裂為各個孤立的要素再加以取捨；在歷史文獻的使用過程中和過程後，充分進行學理化的演繹去發掘文本自身客觀存在的理論特徵和價值體系，西方那種線性的思維方式和由此帶來的以演繹歸納等抽象理念為特徵的種種研究方法，可以較好地幫助我們達到上述目標。況且，社會在不斷地前進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使人們的觀念產生了巨大的變化，適應和加速這種變化的研究手段也在不斷地產生和變化，我們如果在研究手段上抱殘守缺、故步自封，就不能適應這個變化，就不能推動研究觀念的

<sup>53</sup> 傅璿琮等《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的思考》，《文學評論》1992.3。

改變，也就無法實現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轉換。早在 20 世紀初，我們的前賢們已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向域外文化去尋求支援。梁啟超曾將我國的傳統治學方法與西方學術作一比較：

我國學者，憑冥想，敢武斷，好作囫圇之詞，持無系統之說；否則注釋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張。泰西學者，重試驗，尊辯難，界說謹嚴，條理綿密，恒以批評的態度出之，常思正其誤而補其缺。故我之學皆虛，而彼之學皆實；我之學歷千百年不進，彼之學日新月異無已時，蓋以此也。<sup>54</sup>

此文題為《不健全之愛國論》，也頗讓人深思。因為國人的固步自封和對域外文化的抗拒，往往是覆蓋在我國優秀文化傳統這面堂而皇之的大旗之下的。其中最具迷惑力的一點是：西方任何一種可行的理論，中國早已有之；西方任何一個發明創造，無不可以在中國找到源頭，自然科學方面自不必說（連電腦的二進位制都來源於《易經》），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西方的「象徵論」、「境界說」、「移情說」等，我國古代文論中早已有之，就連「接受美學」，我國漢代的學者就說過「詩無達詁」。其實，有過類似的提法是一回事，有自己的體系、有明晰深刻的理論闡述又是一回事。這種沈湎傳統、固步自封所造成兩者間有意無意的混淆，這可能是我們古代文學研究學科體系至今未能完備的主要原因之一。王國維則主張學習西方形而上的研究方法，以「提高中國人的思維能力」，並引進「寫實主義」等新學語，認為中國詩歌「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sup>55</sup>企圖以此來改造中國傳統的感悟方式，使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同經學、史學剝離。胡適則將「歸納」法看成是改造中國學術「起死之神丹」之一。<sup>56</sup>幾乎與此同時，聞一多在古代文學研究方法上有更多的創新，他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楚辭是眾所周知的，在《詩經》和唐詩研究上，他更多地採用西方的美學鑒賞和地域文化理論來把握其特質和作家風格的形成。他從審美角度稱讚《春江花月夜》「如夢境的晤談，有的是強烈的宇宙意識，被宇宙意識昇華過的純潔的

<sup>54</sup> 《國民淺訓》第 12 章“不健全的愛國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6。

<sup>55</sup> 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見《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人間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

<sup>56</sup>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見《國學季刊》1 卷 1 號。

愛情，又由愛情幅射出來的同情心。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sup>57</sup> 他認為從美感來說，與《春江花月夜》相比，盧照鄰、駱賓王，甚至劉希夷的那個「年年歲歲花相似」都只是個過程，一首《春江花月夜》就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之罪」。對賈島，作者又從接受美學和時代文化出發，來揭示其靜、瘦、冷、暗的風格特徵，並把這種風格同宋末的四靈、明末的鍾譚、清末的同光派放在一起加以綜合考量，指出「每個在動亂中毀滅的前夕都需要休息」，因此「每一個朝代的末葉都有回向賈島的趨勢」。<sup>58</sup> 這當中作者也考量時代政治和社會環境對詩人及其風格的影響，但卻在一個大的背景下揭示了詩人風格的形成和文學流變的總體特徵，比起幾十年後有段時間研究者們習用的庸俗社會學分析法來，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王瑤曾指出：「即使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東西，也必須廣泛從外國的學術文化中汲取營養。文學研究要發展，必須不斷地更新研究的觀念和方法，而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來學術文化的優秀成果」。王氏開列了從王國維到錢鍾書一長串名單，來證明「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創新和開闢局面的大學者，都是從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進和汲取了外國的文學觀念和治學方法的」。<sup>59</sup>

大陸改革開放的二十年，在古代文學研究上不僅上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二十年，也是研究觀念、研究方法變化最大的二十年。八十年代初，當一些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將心理分析、定量分析、系統論、符號學、語義學、接受美學、結構主義、比較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從西方引進時，古代文學研究界持批評、懷疑者居多認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必須立足於經過千年歷史考驗的傳統治學方法，不必盲目崇洋」，所謂運用新方法只不過是「套用新方法，濫用新名詞，以文飾其淺陋」，而且認為它敗壞了學風：「以至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學界有一部分人，仍熱衷於撰寫虛空、浮泛，徒有方法之新穎，而無突破之實質的文章」。但經過二十年的探索、實驗、猶豫、爭論後，儘管一部分學者仍堅持八十年代以來的否定態度，但大部分學者則已認識到傳統的研究方法必須變化，必須尋找新的研究方法才能適應世紀的新變。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已漸漸成為當今古代文學研究者的共識，他們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很大一部分的古代文學研究論著觀點內容重複、論點相似、手法陳舊，在低水平上徘徊而無實質性的突破，這正說明我們的研究者是多麼需要更新觀念、改變研究思路和手法。「而域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正好可以使我們打破學界封閉多年後形成的千篇一律的研究模式，可以為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使之生生不息，亙古常新」。<sup>60</sup>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全盤西化，而應當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重實據、重情韻、重領

<sup>57</sup> 《唐詩雜論》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21 頁。

<sup>58</sup> 《唐詩雜論》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43 頁。

<sup>59</sup> 陳平原《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小引》，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sup>60</sup> 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鑒 1999。



悟與西方的重理性、重演繹、重系統的方法論結合起來，做到古今結合、中西結合。「研究方法應多種多樣，每種方法都宜重視。國外有很多新的方法，我們掌握得並不夠。二者應結合，不宜割裂」。<sup>61</sup>「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完全可以中西結合、古今結合，各種方法交替使用、並駕齊驅」，<sup>62</sup>另外，從引進者來說，對新方法運用也已注意克服八十年代的浮躁，不再急功近利、盲目引進、囫圇吞棗、生搬硬套；也不再對此焦慮困惑、無所適從，而是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廣闊而深厚的背景，去尋求與此相契合的表達體系。從批評者來說，這種趨向性的共識的形成，有助於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上的現代化。大陸學者的這種認識和在實際操作上作出的努力，也給海外的漢學家尤其是臺灣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很大的啓示。樂黛雲將這種中西結合的研究方式稱之為雙向性的「闡發研究」，因為它既是用西方文藝理論和方法來闡釋中國古典文學，又同時在用中國傳統理論去解釋西方。<sup>63</sup>相比之下，臺灣學者在新方法運用上，無論從研究者的興趣，使用者的數量會的反響都要滯後一些。臺灣學者遊志誠對此曾作過比較。他說：「中文系出身的學者即使用西方理論，多半屬於輔助性、註腳式的運用，直接運用和系統套用的程度顯然不足。反觀大陸中文界則不然，他們透過譯本原典或直接引述，在論文中大量應用西方理論。較有深度者，還保留中國本位觀點，盡力在西方理論之後回歸中國古典傳統的模式習套，再盡力適合古典的語彙或觀念加以統攝綜合，提示綱要。這種精神及此精神支援下的理念與方法，每每是臺灣學界所欠缺的」。<sup>64</sup>

### 三、參與現實文化創造、體現當代人文關懷

學科的生命力往往取決於現實生活的需求，因為生活之樹常青，而理論往往是灰色的。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人文學科的確立，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就是能否為當代社會提供其他學科無法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文化功能和人文關懷，能否參與當代的文化創造，否則，它就會缺少生命力，就會被其他學科所侵吞，或被在現實生活中更有活力的相近學科所取代。就古典文學研究而言，這種當代的人文關懷就是要能以提供經驗或揭示規律等方式來豐富和發展當代文化，提供它所獨有的情感撫慰和靈魂淨化等精神文化功能，這樣才不會與當代社會疏離，才不會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才會有鮮活的生命力。20世紀初古代文學研究的先驅者們已較清醒地認識到參與當代文化建設的必要性。梁啓超就對當時封閉于現實生活和當代文化之外的詞章考據之學極為不滿，認為「考據之蠹天下，其效極於今

<sup>61</sup> 轉引自尚永亮《唐代文學研究應朝什麼方向發展》，唐代文學研究年鑒 1999。

<sup>62</sup> 轉引自杜曉勤《關於唐代文學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鑒 1999。

<sup>63</sup> 轉引自遊志誠《大陸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述評》，臺灣學生書局《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 40 頁。

<sup>64</sup> 《大陸古代文學研究述評》，見《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生書局 1991。

日」。在其研究論文《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中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提出「文學救國」，指出文學可以影響人心、改革社會，以此把文學與世變聯繫起來。胡適則強調文化與政治間的關連，「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劃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懶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sup>65</sup>為了使古代文學研究參與新文化建設，胡適著《白話文學史》，對《詩經》和漢樂府，他以一種平民的思維方式作出新解，力圖使古代文學研究不脫離當時呼聲很高的「民主」、「民權」時代主潮。聞一多在古代文學研究上的貢獻之一就是讓文學研究貼近時代、貼近生活。他「希求用《詩經》時代的眼光讀《詩經》」；他認為要讀懂唐詩，先要懂得「詩唐」一詩的唐朝；他第一個將屈原稱為人民的詩人，「古今沒有第二個詩人象屈原那樣曾經被人民熱愛的」，「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最唯一又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sup>66</sup>。梁啟超等前輩這種使古代文學研究積極參與當代的文化創造的努力，無疑是可貴的。

問題在於今天。我們本來可以沿著前賢開闢的道路去進一步參與現實的文化創造，在溝通中去獲得社會的理解和認可，上面提到的研究觀念的轉變和研究手段的多樣已為參與現實、溝通社會破除了若干障礙，社會的逐漸富裕和對文化領域的傾斜更為這種參與提供了可能，但是由於商品大潮的衝擊和當今人們對傳統的陌生和疏離，使我們的一部分古代文學研究者在價值取向上發生了偏離。這種偏離，有幾種不同的形態：一種是迎合世俗，進行把嚴肅的學術研究變成商業炒作，以大量的重復勞動來取代替學術的生命—發展和創新。第二種是消極的規避，化解參與意識。把社會的巨變和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疏離，統統稱之為世俗化，而把隔絕于現實生活的自我封閉稱之為獨善其身。把學術這個歷來的「天下之公器」變成個人孤芳自賞的私物，並以個人和小圈子的評品代替社會價值的檢驗。有人甚至提倡隱士精神，「他們對自然的熱愛，對真實無偽、獨立自足的道德人格的堅守，對文化的進取，對生命自由的摯著，都永遠具有積極的、文明的價值，永遠滋養著人類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現代人可以不取其隱居山林的生活方式，卻不應完全拋棄其文化精神」。<sup>67</sup>第三種是採取取消主義。他們看到古代文學研究與現代社會的疏離，失去了與社會對話的語言和渠道，他們不是去溝通和介入現代生活，而是導致對自身的否定。他們懷疑「二十世紀的文學教學和研究究竟有什麼意義」，他們認為：「在大學校園裏，國學已成為以學分標誌的一門知識、技巧，專門用於生產良民版的博雅之士」；「是合格的寫字師傅在培養合格的徒子徒孫，是把高考的作文尖子經四年培養成為初通求職報告寫法的文祕，是把我們學生從有話好好說培養成有話不會說」。<sup>68</sup>自身的無所作為導致對學術

<sup>65</sup> 《我的歧路》見《胡適文存》2集3卷。

<sup>66</sup> 《聞一多全集》甲集259頁。

<sup>67</sup> 《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代審視—99廣東省古代文學博士研討會述要》，學術研究2000.1。

<sup>68</sup> 《全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博士點新世紀學科展望及資訊交流座談會發言選載》文學遺產1999.2。

傳承的否定，而對傳統的採取的虛無主義態度又必將導致自我價值。第四種是對古代文學研究在當今社會的尷尬境表現出一種無奈，以自我安慰來掩飾其無所作爲，主張「學人在古代文學失去主流話語地位後，只能以平常心待之，把古代文學研究看作是對價值的弘揚，對信仰的追求」。<sup>69</sup>

在理念上，臺灣學者對古代文學研究必須介入現實生活亦多數持肯定態度，如陳慶煌在《五四以後傳統文學的承續與困境》一文中就認爲「傳統與現實不可脫節，脫了節，那「統」就「傳」不下去」。<sup>70</sup>但在實際研究中，一種是固守名山事業，對現實的影響或誘惑極力拒，更多的則轉向現當代文學和臺灣本土文學，據有關人士估計，比例約在一半以上。至於古代文學研究如何體現當代人文關懷，和現實社會溝通，這當然是個急待研究的課題，但我想實現研究觀念的轉換，融入現代的研究手段應當是個前提，將學術成果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也應當是個途徑。清末的《唐詩三百首》是個很成功的先例，這個婦孺皆知的唐詩選本拉近了古代文學與現當代人們的距離，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胡雲翼的《宋詞選》、馬茂元《唐詩選》、王士菁的《唐代詩歌》馮至的《杜甫傳》、王瑤的《李白》、浦江清的《杜甫詩選》這些選本和知識讀本也伴著一代代的青少年走過人生成長之路。今天大陸和臺灣的一些老專家也都很注重古代文學知識的普及和與當代的溝通，如程千帆、沈祖棻既有《唐代進士與文學》這類專著，又有《唐人七絕淺釋》、《〈唐詩三百首〉的編者》這樣通俗淺顯的賞析和介紹，王瑤既能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這樣的學術專著，也能去寫《李白》這類通俗的小冊子。羅聯添既有精深的《韓愈研究》，也有通俗介紹的小冊子《韓愈》；羅宗濤既有《敦煌講經變文研究》，也有講故事式的《石窟裏的老傳說—敦煌變文》。只是從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角度來說，這種普及必須以豐厚的學術底蘊爲基礎，厚積薄發，並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融入其中，而不能象時下的一些選本或鑒賞，輾轉傳抄，疊床架屋，求大求快，給人留下的不是知識和美，而是浮躁和淺薄。

#### 四、張揚學術個性、重鑄學術品格

在古代文學研究的學科建設上，如果說前面三點是針對研究物件而言，這點則是對研究者提出的要求。

文學研究也不是手工作坊，更不是大機器生產，他的研究應當具有不可複製性，不能陳陳相因，千人一腔、千部一面。在主張思想解放、尊重人的個性的今天，尤其是大陸的學術研究在歷經「文革」和多年「左」的桎梏後，重提張揚學術個性，是適應時代的需要，也是研究者實現自身價值的需要。

<sup>69</sup> 《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代審視—99 廣東省古代文學博士研討會述要》，學術研究 2000.1。

<sup>70</sup>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臺灣學生書局 1990。

張揚學術個性實際上包含兩層內涵。

一是其研究風格應該是獨特的，聞一多是位學者，也是位詩人，還是個受過正規訓練的畫家，他常用詩人的豐富情感和畫家對色調的敏感來體悟和把握中國古典詩詞，使嚴肅的學術論文帶上獨有的詩情畫意。他的論文《孟浩然》就是從一幅孟浩然的畫像談起。他的研究《楚辭》的論文《〈九歌〉古歌舞劇懸解》手稿中，就畫了一幅《山鬼》的插圖，幽深而恐怖。旁邊還寫了幾行詩句：「你思慕我時，會來一套含涕妍笑的媚態」，「蟲聲單調得象我們自己的耳鳴。一隻蝙蝠飛過，草中簌簌作響，公子嗅著手裏的花香，爬上坡來，時時回顧向他後面的山峰張望」。這種充滿詩情畫意的獨特研究方式，無疑也加深了他對《九歌》的體悟和理解。朱自清評聞一多的《唐詩雜論》，說他「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sup>71</sup>聞一多的研究者劉恒也認為聞「將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寫成富有詩意的散文，傳播到廣大讀者中去，這是一個創造」。<sup>72</sup>蘇雪林和王蒙對李商隱無題詩的研究，則是用一個小說家的想象力來尋繹李商隱無題詩所隱藏的戀愛本事，其結論雖然值得商榷，但這種研究風格的本身就是文學的、充滿感情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所表現出語言的犀利六朝語錄式簡潔，讓人一看就知道是魯迅的，他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稱《世說新語》「記言則玄遠冷靜，記行則高簡瑰奇」，稱《儒林外史》是「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不但成為定評，而且讓人久久難忘；錢鍾書論學，西方式的思辨加東方式的諧謔，調侃之中又蘊深邃哲理，也讓人一看就知道這就是錢鍾書。林庚寫《盛唐氣象》，其氣魄也象盛唐一樣闊大，也象這個詩的時代一樣充滿詩情。朱自清對批評史的探討習慣沈醉於理性的思辨，陳寅恪的學術論文雖同樣以理性為特徵，但卻是通過文化史的批評和一種前瞻性的思考來實現的。在學術研究中只有突現不同的研究風格，才能表現出研究者真正的自我，也才能吸引廣大個性各異、審美追求也各異的讀者。因為今天的讀者對古典作品的認識，既需要理性的把握，瞭解其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也還有個人審美感受上的需要。從接受美學來說，後者又受到讀者自身的情感體驗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精神需求，所謂「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研究者只有發揮不同的研究個性，才能與接受者不同的精神需求相一致。

二是研究方式的獨特。一位學者學術地位的奠定，不僅在於其學術思想的深邃和超越前人，也在於其研究方法的獨特、創新。「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這是胡適的學術主張，也是他獨特的研究方式。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胡適憑藉著這枚度人金針，既奠定了自己在新文化運動中先驅者的地位，也使這一研究方法成為本世紀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學術口號。「以詩證史」，是人們對陳寅

<sup>71</sup> 《朱自清文集》（三），江蘇教育出版社 1988，122 頁。

<sup>72</sup> 《聞一多研究中國文學的獨創性》，見《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第 459 頁。

格獨特的研究方式的簡括，它產生于打通文史，以求通解通釋這一學術主張，其內涵包括以詩證史，也包括以史說詩，還包括以小說來填補史料之不足。這種研究法，不僅使他產生了《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這些古代文學研究史上的豐碑，也使學術史上增添了一種可以啓迪後人的研究方式。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語義學與考據學的融通，這是朱自清獨特的治學方法，這也是他在短暫的研究時段和極艱難的環境中，寫出《詩言志辯》、《李賀年譜》等重要學術著作的重要原因。近二十年來，由於倡導多種研究方法，有的學者也在中西比較和綜合吸收中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式。如傅璿琮以傳統的考據功底參之以丹納的詩人群體論和地域文學理論，在放在文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研究。他用這種方法寫的《唐代詩人叢考》，成爲新時期唐代文學研究的開山之作。但對大多數研究者來說，在研究方法上還沒有找到自我。他們博采得多、吸收得多，但還沒有凝聚交融，化爲一家之法。五十年代後，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成果甚豐卻沒有更多地出現廿世紀初那種大家，世人對古代文學研究的關注也逐漸式微，我想與只重師承缺少創新，只重吸收卻缺乏個性是否有關。

對當前來說，張揚學術個性的同時還要重鑄學術品格。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它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物樹立一個正人、正己、正天下的標準和尺度。作爲執此公器的學者，首先就必須出以公心。故不爲曲學阿世，「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一直爲學者們所尊奉並形成爲我們的學術傳統。但是，我們生存的環境又總是在用不同的手段迫使或誘使學者偏離這個軌道：或是用暴力去壓迫、去強制性地改變，或是用物質去誘惑其自覺或不自覺地偏離。在世紀之交的急劇變化和商業大潮的衝擊下今天，就更容易將名山事業的把握和自持讓位於浮躁淺進和急功近利：或是用商業炒作的方法來進行學術研究，或是用唯我獨尊和以圈子劃線作爲學術評價的標準，或是以學術外的攻訐和手段置換正常的學術爭論，或是以庸俗的互相捧場取代嚴肅的文藝批評。面對新世紀的波詭雲譎、物欲橫流，學術品格的重鑄顯得尤爲重要。因爲喪失了學術品格的學者和趨時之作，是不會有學術生命的。

這種學術品格的重鑄首先應是學術人格的重鑄。一千多年前，司馬遷就爲史學家確立了一個學術人格：「不虛美，不隱惡」，那麼，古代文學研究者是否也應堅守一種品格，至少不去「曲學阿世」？面對大千世界的光怪陸離、潮起潮落，我們可否「咬定青山不放鬆」，既不迎合世俗以求「名」，也不消極避世以求「靜」；既不自吹自擂或互吹互擂「填補空白」、「重大突破」；也不浮躁淺薄處心積慮去製造「轟動效應」；既無門戶之見，又無輩份之分。這種學術人格的重鑄既是我們的學術追求所必需，因爲學術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人類愈臻善境，去預示和追求一個遠比現實更爲美好的未來，所以學者首先就必須是個「善」者。同時，這種學術人格也是我們深入瞭解研究物件所必需，因爲作品與人品是密切關聯的，誠如聞一多體會的那樣：「人品與詩境是密切關聯的」，「中國詩寫胸襟，人格美的

自然流露，並非做詩——身外成就」。<sup>73</sup>我們要把握古典作品的精髓，就必需瞭解作家的人品；要真正把握他的人格美，自己的人格也必需是美的，這才能感悟，才能溝通。做詩是身外成就，研詩何嘗不是身外成就？這也就是中國學者一直將道德、文章相提並論的原因。臺灣中央研究院內的草坪上有塊石碑，上面鐫著一篇《學人銘》：「對新知的探求，不知東方之既白；對真理的堅持，雖千萬人吾往矣；對人類的關懷，衣帶漸寬終不悔。在這裏，激蕩智慧，超越自我，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以回饋這塊土地及整個人類」，這是學術人格的詩化，惟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學術成果，才能贏得世人的尊敬，也才能為古代文學研究包括漢學研究贏得現在和未來。

其次是理論品格的重建。對西學，既不盲目搬用，也不固步自封；既不盲目聲稱中國詩學理論早已自成體系，西方文論的種種探索在中國古典文論中早已解決，也不搬用西方的新學科、新思維去套中國古典詩學，把中國古典詩學僅作為詮釋西方文論的例證，並以此津津樂道，自視通才；對舊學，既不盲目崇拜，把老祖宗傳下來的史料學、考據學視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唯一途徑，皓首窮經，樂此不疲；也要正視當前學人國學功底薄弱，只會尋求一些時髦的名詞術語，「以艱深文其淺陋」；對新學，既不趨奉，愈新愈好，浮躁淺薄、急功近利，也要看到多學科的結合，多種研究手段的運用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必然發展趨勢，從而吃透兩頭，多下些理論建樹和融彙貫通功夫。與此同時，還必須統一和嚴格學術規範，儘量避免二手資料轉引，唾棄剽竊尤其是隱性剽竊，這不僅是重鑄學術品格的需要，也是適應研究手段的現代化和進一步走向世界的需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儘快地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既有獨立性又富有相容性的中國詩學體系。

---

<sup>73</sup> 據聞一多手稿，見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過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1-31, No.8, May 2004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System

*You-Bing Chen*\*

##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re analyzed, and ways to deal with the difficulties are shown. One way is to take part in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reflect o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carefully. The second way is to re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and explicit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which should be a steady and exoteric system. The third approach is to find the key problem of the research to create variabl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and to advan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he last is to exert the research individuality and rebuild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These ways are put out to seek the living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erfection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Keywords** :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system, research problem, research history, research directions

---

\* Director and Researcher, An 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of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Professor, An Hui University